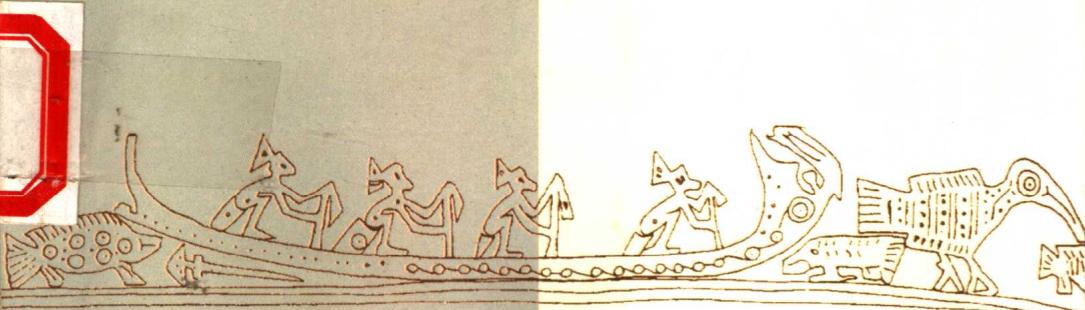


中国 古代 经济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
· 齐涛 / 主编



中国 古代 经济 史

齐 涛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经济史 / 齐涛主编 .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12 (2001.11 重印)

ISBN7-5607-2086-2

I. 中… II. 齐… III. 经济史 - 中国 - 古代 IV. 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552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安丘一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125 印张 445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1—8000 册

定价：21.80 元

目 录

绪论	(1)
一、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1)
二、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	(13)
三、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	(19)
四、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问题	(25)
五、经济区划问题	(33)
六、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	(40)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42)
第一节 中国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	(42)
一、历史气候及其变迁	(42)
二、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变迁	(48)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人口与人口问题	(57)
一、中国人口发展概况	(57)
二、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的特点	(63)

三、古代人口问题及其实质	(67)
第三节 中国古人的自然灾害	(71)
一、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种类	(71)
二、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特点	(76)
三、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影响	(80)
第二章 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	(84)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原始经济	(84)
第二节 三次社会大分工	(87)
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88)
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94)
三、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99)
第三节 中国古代传统经济结构的形成	(104)
一、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特点	(105)
二、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	(107)
三、工商业经济结构的形成	(113)
第三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120)
第一节 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经济	(120)
一、铁农具的出现与普及	(120)
二、牛耕技术的使用及发展	(122)
三、耕作方式的进步	(124)
四、水利工程的开发与兴修	(126)
五、耕作水平的提高	(129)
六、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初步发展	(132)
第二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农业的逐步发展	(135)
一、耕作水平的提高	(135)

二、栽培技术的改进.....	(144)
三、农产品加工技术的进步.....	(147)
四、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148)
五、粮食品种及产量的增加.....	(156)
第三节 隋唐宋辽金元时代农业发展的成熟.....	(160)
一、人口的繁殖与田地的垦辟.....	(160)
二、生产技术的改进及水利事业的兴修.....	(164)
三、作物品种的交流及土地利用的扩大.....	(173)
四、经济作物的推广及粮食产量的增加.....	(178)
第四节 明清时代的农业状况.....	(185)
一、耕地的垦辟及农田水利的建设.....	(186)
二、粮食新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190)
三、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199)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	(206)
第一节 从井田制到授田制.....	(206)
一、井田制.....	(207)
二、从井田到授田的变化.....	(209)
三、战国的授田制.....	(212)
第二节 汉晋南朝的土地与赋役制度.....	(217)
一、两汉的土地与赋役制度.....	(217)
二、曹魏时期的屯田制与户调式.....	(228)
三、两晋南朝的占田制.....	(235)
第三节 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	(241)
一、北朝的均田制.....	(242)
二、唐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251)
第四节 两税法的历史转折.....	(258)
一、两税法出现的历史条件.....	(258)

二、两税法的历史渊源	(263)
三、两税法的确立及基本内容	(266)
四、两税法的历史地位	(272)
第五节 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	(274)
一、宋元土地与赋役制度的基本状况	(275)
二、张居正改革与一条鞭法	(282)
三、摊丁入亩与清朝的赋役制度	(289)
第五章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	(293)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代手工商业与城市经济的初次繁荣	(293)
一、战国秦汉时代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293)
二、战国秦汉时代商业流通的发展	(299)
三、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与城市经济	(30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手工商业与城市经济的曲折进展	(307)
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307)
二、商业的起伏与繁荣	(313)
三、城市与城市经济的进展	(318)
第三节 宋明时代手工商业与城市经济的再度繁荣	(323)
一、手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	(323)
二、商业流通的活跃	(329)
三、城市经济的繁荣	(335)
第四节 清代手工商业与城市经济的状况	(342)
一、清代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342)
二、商业流通的发展	(345)
三、工商业市镇的发达	(349)

第六章 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	(353)
第一节 从“工商食官”到王莽新政	(353)
一、“工商食官”的终结与新型工商政策的建立	(354)
二、抑商与西汉的工商货币政策.....	(363)
三、王莽的复古“新政”	(377)
第二节 东汉至隋唐工商货币政策的演变	(382)
一、盐铁政策的变化.....	(383)
二、严密的官手工业政策.....	(388)
三、商贸货币政策的发展.....	(393)
四、榷盐法与传统工商政策的转型	(398)
第三节 宋明工商货币政策的成熟	(405)
一、专卖体系的完备.....	(406)
二、商贸政策的多元化.....	(413)
三、货币政策的新进展	(419)
第四节 清代工商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	(425)
一、匠籍制的废止	(426)
二、商贸政策的继续松动	(431)
三、工商货币政策的去向	(437)
第七章 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	(442)
第一节 战国秦汉经济区划的定位	(442)
一、中国古代经济区的出现	(442)
二、战国时期经济区的分立	(444)
三、两汉经济区划的定位	(44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区划的变化	(453)
一、三大经济区的对立	(453)
二、江南基本经济区的形成	(455)

三、唐代经济区域的转化	(457)
第三节 宋元明清经济区划的新格局	(462)
一、经济重心的南移	(462)
二、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477)
三、边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485)
第八章 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古代经济的归宿	(491)
第一节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491)
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历史条件	(491)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496)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499)
第二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经济的互动	(502)
一、资本主义萌芽对传统经济的侵蚀	(503)
二、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	(505)
第三节 中西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道路的比较	(511)
一、中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环境不同	(511)
二、中西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道路与结局不同	(517)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归宿	(525)
一、中国古代经济的命运	(526)
二、中国传统经济的历史归宿	(531)
后记	(540)

绪 论

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学科，对它的学习与把握应当立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立足于它所存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用综合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构筑整体的经济史观，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脉络与特性，探寻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比如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经济技术发展的道路问题、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传统经济的归宿问题等等，都应当有所思考，有所认识。

一、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以往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地理环境为例，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提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

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①

长期以来，斯大林的这段论述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奉为圭臬的经典论述，而且，它又被举一反三，举凡有关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所有作用都成为禁忌，否则，便踏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雷阵。

斯大林的这段论述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这一论证本身无法成立，他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

近二十年来，在地理环境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禁忌，但它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犹在，人们对自身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地理环境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它本身以及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仍局限于一般性的表象论述，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也是如此。

地理环境不是指一般的地理面貌，而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以及自然灾害等等，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①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40 页。

一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特性的影响，对此列宁在《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批注》中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他还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性是什么。

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

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虽然中国与欧洲的面积大致相当，但欧洲平均海拔只有三四百米，宜于农业的平原面积有 100 亿亩，占其全部面积的 57%。中国平原面积 12 亿亩，仅占国土面积的 8.5%；即使加上海拔 500 米以下的丘陵地带，理论可垦面积也只是 19 亿亩，为欧洲平原面积的 1/7。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的人口又约略相近。因此，耕地面积与所承受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直至今日，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更加尖锐。

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欧洲全洲无低纬度土壤，高纬度的灰化土是全欧面积最大的土壤，其次是褐色土、棕色森林土等，均有良好的蓄水性与可耕性。中国的农业地区除东北一隅外，绝大部分土壤属物理性状较差的盐碱、红壤等。《商君书·算地篇》即云当时全国土地中“恶田居什四，良田居什二”。

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欧洲山脉不高，多为东西走向，极地海洋气团可由大西洋沿岸直达乌拉尔山，全洲多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均匀，较少灾害。中国的山脉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全国大部分地区又处于西北大陆干旱风与东南海洋风之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59 页。

间，雨量分布不匀。全国季降水变率每每超过 50%，易于形成灾害性天气。据统计，自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1936 年间，我国历史上有案可稽的自然灾害就达 5150 次，平均每半年即有一次。^① 即使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下，我国 15 亿亩耕地中每年也还有 4 亿亩以上面临水旱威胁。^②

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耕、织还是畜，都以土地经营为基础。那种可游离于土地经营之外的畜牧业仅在夏商时代占有一定的位置。此后，由于可垦土地的狭小与人口的增长，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快就被小块垦殖的精耕细作的种植业所排挤。商代的大型祭祀尚用牲百头，西周则骤降至一牛、二羊、一猪。战国时代的多数国家都已“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③。以后的中国农民只是以喂养猪、鸡等食粮畜禽为主。个别农民所畜养的牛、马等大牲畜，也只被用于农耕，且为圈养，与欧洲农民的畜牧业有着本质的不同。粮食生产之外，中国农民的织主要以桑（蚕）麻为原料，而桑麻生产又多藉于有限的耕地，亦属土地经营的范畴。

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罗马共和国时代出租给农民的土地即多以 300 至 800 英亩为单位^④。中世纪英国一户农奴家庭所拥有的维尔特份地可折合 180 市亩，德

① 参见邓拓《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② 农业部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基本情况》，农业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战国策·魏策三》。

④ [美] 海斯：《世界史》，三联书店 1975 年版，第 229 页。

国农奴的一份胡菲份地可折合 225 市亩。这些土地上作物稀疏，犁耕不深，很少田间管理与水利灌溉，二圃与三圃的轮耕制十分普遍。其农业产量的提高有赖于耕地面积的扩大^①。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中世纪的庄园中均辟有牧场、草场，畜牧业在农民的生产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末日审判书》所记 11 世纪凯迈尔庄园中，除 11 户贫苦茅舍农饲养着一至两头耕畜外，38 户一般农奴均饲养牛三至四头。同书所记诺福克地区的部分农庄中，饲养牛高达 7534 头，羊 46 864 只，马 242 匹。^② 畜牧业的发达，使之为中世纪的居民提供着大量的肉、奶、油等食品以及众多的毛纺织品。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现代社会。

欧洲农牧混合经济与中国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对历史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看不出多大差异，但当社会发展到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交替时期，差异则日渐显著。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但农牧经济中的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就会随社会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发展，从而走上商品化经营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

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

① 参见 [美]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农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转见 [英] 西伯姆《英国农场史》，伦敦 1925 年版。

变化为例，这一时代正处于五千年来第三个低温期，其最低点为公元 400 年前后，也就是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初期，在这一时期，年平均气温较之今天低了近 2°C ；较之温暖的秦汉时代，要下降 $2^{\circ}\text{C} \sim 3^{\circ}\text{C}$ 。

天文学与气象学研究表明，寒冷期与干旱密切相关，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而寒冷与干旱相合，则成为影响与制约农业生产的重大危害。

张家诚先生曾经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 1°C ，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 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 100 毫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 10%。^①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②。吴慧先生曾认为，如以统一的含量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 132 公斤，东晋南朝为 125.35 公斤，较前朝下降 2.84%。这儿下降的 2.84%，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反比秦汉上升了 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 128.8 公斤，较之秦汉，下降 2.84%。

气候的寒冷与干旱对魏晋南北朝时代农业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它推动着北方农牧分界线的南移。有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某一地区年平均气温降低 1°C ，就等于把这一地区向高纬度推移 200 到 300 公里；同样，如果天气干旱，年降水量减少 100 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就会向南推移 100 到 500 公里，也就是说，年平均气温每下降 1°C ，我国北方农业区就应当大幅度南移。^③

① 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载《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

② 王馥棠：《世界气候与粮食产量的预测》，载《气象知识》1984年第1期。

③ 参见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张家诚等《国土利用的几个气候问题》，载《国土研究班讲稿选编》（内部印行）。

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北方（包括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与此同时，则是农耕区的退缩与畜牧区的扩张。秦汉时代，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帝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始皇帝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汉书·武帝纪》云：“（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大不相同了，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所描绘的景象十分典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不仅如此，在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时，束皙即言：“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尤多，田诸苑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②因此，他主张“可悉徙诸牧”，以充冀州一带，“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③。这里，“空虚之田”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候因素。

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便开始向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进入文明的门槛后，这种影响的力度更以加速度的方式递增。人们开垦荒地，采伐林木，兴修水利，开采矿藏，不断地提高着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促使自然环境发生着种

① 杜文澜：《古诗源》卷一四《敕勒歌》。

② 《晋书·束皙传》。

③ 《晋书·束皙传》。

种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当然是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晶，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的生产与社会活动。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又必然地对人类社会发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已明确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①

在这儿，我们暂且不将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可以观察与分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对于第一步，也就是取得了预期结果的胜利，史学界已经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有些时候甚至被陶醉了。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土地的垦殖、水利的兴修，称颂着我们的先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绩。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再多着笔墨，我们还是冷静地分析与观察一下这一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所发生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影响，也就是它们对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负面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影响中，以森林植被的破坏最具深远影响，特别是北方地区与西北地区更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